绪　论

传统的文学研究总是习惯于强调历史与文学及当下的关系。因此，在研究者确定其学术选题之后，读者大都会质询其研究对象的历史身份并竭力将其做历史化或当下性的解读。然而，在寒山和寒山诗这一问题上，却让人即便大费周章，可能也只能落得个束手无策的尴尬结局。寒山究竟何许人也？美国著名汉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薛爱华（Edward Schafer, 1913—1991）在 1975 年出版的权威文选《葵晔集》（*Sunflower Splendor: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oetry*）的文末附录中曾这样写道：

> 寒山是地名也是人名。对于将寒山当作避难所的这个人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寒山是他的精神象征也是他的笔名。……在他死了数百年之后，他成了禅教神话，……在之后的艺术作品中，他经常被描摹成一个疯疯癫癫的人物：一个衣冠不整、咧嘴傻笑、快乐的社会弃儿。很难相信他的诗为他造就了这么大的名声。[1]

千百年来，人们对于寒山的了解大抵如此。严格说来，寒山在艺术史和宗教史中的盛名，却远甚于他在文学世界中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文学史的宏大叙事体系中，寒山和寒山诗甚至从未真正进入过精英知识分子的关注视野。即使是在众声喧哗的后经典时代，寒山诗也一直游

1　Liu W. & Lo I. (eds.). *Sunflower Splendor: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oetry*. Bloomington &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5: 549.

离于中国文学经典形式库的边缘地带。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始，西方世界却给予了寒山和他的那些诗以崇高的文学礼遇。“寒山热”的狂潮横扫欧美大陆，从美国西海岸地区到大西洋沿岸诸国，从地中海流域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寒山和寒山诗的足迹几乎遍布所有海外汉学研究的重镇。无论是普通的文学读者，还是专业的知识精英，都无一例外地开始关注和追捧这位域外来客。

0.1　作为文学“弃儿”的风狂诗隐

寒山的身世谱系，现已无从详考。流传下来的相关文献，因为多少夹杂有传奇和神话的成分，以致研究者实难辨其真伪。据传闻记载，因其长年隐居于浙江天台的寒岩一带，故而自称寒山或寒山子。实际上，是否确有寒山其人，学界至今仍颇多质疑。这里姑且援引宋释赞宁所撰《宋高僧传·卷十九》的相关记述，再度回溯中国文学史上的这桩离奇公案：

> 寒山子者，世谓为贫子风狂之士，弗可恒度推之。隐天台始丰县西七十里，号为寒暗二岩，每于寒岩幽窟中居之，以为定止。时来国清寺。有拾得者，寺僧令知食堂，恒时收拾众僧残食菜滓，断巨竹为筒，投藏于内。若寒山子来，即负而去。或廊下徐行，或时叫噪凌人，或望空曼骂。寺僧不耐，以杖逼逐。翻身抚掌，呵呵徐退。然其布襦零落，面貌枯瘁，以桦皮为冠，曳大木屐。或发辞气，宛有所归，归于佛理。初闾丘入寺，访问寒山。沙门道翘对曰：“此人狂病，本居寒岩间，好吟词偈，言语不常，或臧或否，终不可知。与寺行者拾得以为交友，相聚言说，不可详悉。”寺僧见太守拜之，惊曰：“大官何礼风狂夫耶？”二人连臂笑傲出寺，闾丘复往寒岩谒问，并送衣裳药物，而高声倡言曰：“贼我贼。”退便身缩入岩石穴缝中，复曰：

> “报汝诸人，各各努力。”其石穴缝泯然而合，杳无踪迹。乃令僧道翘寻共遗物，唯于林间缀叶书词颂并村墅人家屋壁所抄录，得三百馀首，今编成一集，人多讽诵。后曹山寂禅师注解，谓之对寒山子诗，以其本无氏族，越民唯呼为寒山子。至有“庭际何所有，白云抱幽石”句。历然雅体。今岩下有石，亭亭而立，号幽石焉。[1]

上述文字记载在多大程度上呈现了历史真相，如今已无从查证。然而文中所流露的传奇色彩倒的确令人称奇。有西方学者曾对这种叙事风格大加揶揄，认为不过是好事者从某个迷信的庄稼汉那里听得的离奇故事。然而，有识者却依据文献中罗列的人名、地名、官衔及其文体风格，考证后认为，这样一个传奇人物大致生活在一个“各阶层文人都热衷于作诗、吟诗和赏诗”[2]的时代。事实上，后世的文学读本与文学选集也习惯称其为“唐代诗人”，然而对于他生活时代的分期归属，却一直难有定论。

撇开上文的蹊跷文字不谈，至少读者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到一个栩栩如生的隐者形象。有意思的是，如此“布襦零落，面貌枯瘁”的一介贫士，对于自己的诗情与诗艺却有着异乎寻常的“张狂”自信：

> 下愚读我诗，不解却嗤诮。
> 中庸读我诗，思量云甚要。
> 上贤读我诗，把著满面笑。
> 杨修见幼妇，一览便知妙。[3]

---

1 ［宋］赞宁 . 宋高僧传 . 北京：中华书局，1997：484–485.

2 傅汉思 . 唐代文人：一部综合传记 . 倪豪士 . 美国学者论唐代文学 . 黄宝华等译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

3 中华书局编辑部 . 全唐诗 · 卷八百六 · 寒山 · 诗三百三首：第二十三册 . 北京：中华书局，1960：9080.

可以想象，这样一个隐迹民间、“言语不常”之风狂贫士，其人其诗自然难以入得中国文学正统以及文学史家们的法眼。和起初同样颇遭冷遇，后来却大受青睐的六朝诗人陶渊明（365？—427）不同，前者不懈地在其虚构的诗歌世界和前辈名士中隐晦地描情摹景与寻觅知音；[1] 而寒山非但对自己诗歌作品的文学价值直言不讳，而且还在诗中公开表露对于后世知音的期待，以及对其诗作终将“流布天下”的绝对信心：

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
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
不恨会人稀，只为知音寡。
若遣趁宫商，余病莫能罢。
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2]

也许正是洞悉了自己“本无氏族”的文学出身以及题写于“林间村墅”的俗鄙词偈难以见容于当世，所以诗人少了些许超越前辈诗人的文学焦虑，反而流露出一种文学史上难得的妄狂与洒脱。事实上，归属寒山名下的那些诗歌，在其生活的时代可谓知音寥寥；而在其身后的历朝各代，尽管也不乏乐之者与好之者，但其人扑朔迷离的身世、其诗放荡不羁的形式以及通俗浅近的内容，均难见容于追随正统与典雅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体诗学，加之文学赞助人守旧的文学立场和复杂的文学利益等主客观条件的牵制与影响，诗人寒山和寒山诗因此长期游离于中国文学正典的宫门之外。

---

1 有关陶渊明的论述，可参考孙康宜 . 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 . 钟振振译 .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27–39.

2 中华书局编辑部 . 全唐诗 · 卷八百六 · 寒山 · 诗三百三首：第二十三册 . 北京：中华书局，1960：9101.

0.2 从“边缘”到“中心”

当寒山和寒山诗在公元十一世纪越界旅行至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时，寒山诗质朴的语言风格、幽玄的禅宗境界以及诗人不入世浊的隐者情怀、回归自然的生态意识却赢得了日本知识界与普通民众的一致青睐。寒山诗的各种译本、注本和专论竞相问世，寒山的传奇轶事也被改编成为小说和剧本，寒山的禅者形象更是成为日本画界与宗教界的最热门题材。

不过，诗人的传奇文学之旅至此才刚刚开始。继东亚文化圈数个世纪的“寒山热”之后，在二十世纪的欧洲大陆，寒山诗的译介与研究一度成为欧洲汉学的“宠儿”。而在二十世纪的大洋彼岸，这位“癫狂”的中国诗人几乎成为美利坚民族家喻户晓的明星，年轻一代甚至尊奉其为心灵知己和精神领袖，寒山诗更是成为“旧金山文艺复兴”的经典之作。自六十年代始，寒山诗全面进入美国各大文学选集和东亚文学的大学讲堂。

寒山，这位失意的中国诗人，在海外却“意外”地实现了自己生前“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的神奇预言。有意思的是，在海外“寒山热”将诗人推向显赫声名的同时，国人也开始对寒山和寒山诗另眼相待，诗人由此踏上了在故国文学史与学术研究史中续写戏剧人生与传奇命运的新一轮旅程。

当这位荣归的“海外游子”肩负沉甸甸的行囊返程之际，在文学乃至文学之外的诸多领域，中国学界对于这位“贫子风狂之士”的情感从心理层面发生了诸多微妙的变化，而 2008 年 5 月以诗人名字冠名的“寒山子暨和合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天台的盛大揭幕更使这一变化臻于极致。此情此景，怎能不令人唏嘘慨叹？人们不禁会问：一位始终徘徊在故国文学史宫墙之外的诗人何以在越界旅行中叩响了他国文学史同样森严的宫门？故国文评家又何以能放下正襟危坐的姿态来重新接纳这位被他们频频拒之门外的文学“弃儿”？

在《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一书的英文版绪论中，著名华裔汉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孙康宜这样写道："只有自觉而努力地遵循抒情诗的传统，诗人才可以与前辈们竞赛，甚或超越他们。但有些时候，为了给传统重下定义，诗人需要与传统决裂。变革如此之激烈，以至于他有可能受到同时代人的忽视或嘲笑。然而对这样一位诗人的最终酬劳，在于如他所坚信的那样，他的作品将会使他不朽；在于如他所感觉到的那样，将来的某一天在后人中会出现'知音'。这种想得到后人理解的想法，正是中国文学复兴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1] 这种说法也许可以部分地解答读者的上述叩问和疑惑。对于文学传统的反叛固属不易，而对于其不入诗之"正轨"的诗歌理念的笃固与坚守何尝不是以身试法？不过，"反叛"，从某种意义上讲，即是对既有文学传统和现世文学建制的质问与挑战。无论是形式层面还是内容层面的"反叛"与"抽离"，其实恰恰预示了文学革新的可能性和新方向；而"笃固与坚守"无疑从文学前瞻性上最大程度地预设了中国文学的复兴。换言之，对于文学传统的公然挑战是文艺复兴和文学新纪元的必然前兆，而对于这种"忤逆"的诗歌美学之忠贞执守则可能是这种暂时的"边缘文学"走入"文学中心"的重要前提。

0.3　本书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思路

事实上，扑朔迷离的诗人身世、异彩纷呈的寒山诗境、错综复杂的文学之旅、奇特瑰丽的"寒山现象"、起伏跌宕的文学景遇，无一不能成为重要的学术选题。然而，国内学界对于寒山和寒山诗的研究，至今仍主要限于语言、版本、内容、补遗等传统研究的维度；已有的比较研究与影响研究也多集中在中国文学的多元系统内部，即"纵向"研究

1　孙康宜．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钟振振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4.

的维度，而对于其“横向”影响的研究，若非停留于信息介绍与资料罗列的初始层面，即是囿于寒山诗在美国的译介和影响研究。同时，我们还注意到，鲜有学者从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寒山诗的数种外语译本进行过任何实质性的探讨；而对于“寒山现象”在经典建构与（翻译）文学史书写中的重大意义的研究，则几近空白。这些寒学研究的学术遗留问题，正是本书的研究背景与研究动机。

本书旨在将寒山诗置于一个连贯的全球语境中进行系统研究。适当兼顾中国文学多元系统“纵向”研究的同时，将研究重心置于寒山诗的“横向”影响研究。进而探讨意义深远的“寒山现象”之形成与发展，及其对于翻译研究、旅行书写、经典建构及中国（翻译）文学史编撰的启示意义。

在文献考证的基础上，本书详细梳理了多种寒学研究的相关资料，旨在向读者揭示一个丰富多彩的寒山世界。在那里，既有一个充斥着浩瀚史料、诸种传说以及满目考证与假说、亦真亦幻的物质世界，更有令人叹绝的寒山诗国所折射出的绮丽多姿的诗人之精神世界。本书首先在第一、二章考察了中西旅行书写的相关论述，同时在考察作为旅行喻词的“翻译”的基础上，提出文本旅行与经典建构的相关概念及议题。随后，第三章探讨了诗人寒山及其创作的寒山诗在主体文化规范之内的旅行与接受情况；并由此讨论主体文化和主体文学规范对于经典建构的制约与影响。第四章则深度透视寒山和寒山诗的语际文学之旅；进而详细剖析多元文学系统中的寒山诗如何在目的地文化多元系统中脱颖而出并取得中心地位，以及由此带动的东西方“寒学”研究热潮。第五章从多元系统论、改写理论、翻译规范论等描述翻译学的视角与理论框架入手，详尽探讨了寒山诗在美国翻译文学中的经典建构历程。事实上，域外“寒山热”的冲击，使得中国学术界重拾“寒学”研究的兴趣，中国文学史书写开始重新审视寒山和寒山诗的文学地位。第六章因此详细勾勒了寒山诗的返程之旅以及中国学界在西方“寒山热”冲击下的“寒学”研究现状，与此同时，探讨了寒山诗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迄今在中国文学多元系统中的文学史书写与经典化概况及其政治文化关涉。第七章为本书

的结语部分，在总结各章的基础上，反思寒山诗的文本旅行与经典建构历程对于理论旅行、文学史书写以及经典建构等方面的意义，继而提出“寒学”研究的未来思路，同时反观理论的解释力。

当然，由于本选题所涉学科领域众多，如文学史、诗歌发展史、宗教史、语言学史、民俗史、一般精神史、文化史、思想史等多个领域以及中国古代文学、宗教学、语言学、比较文学、翻译学等学科门类，对于某些问题的探讨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第 1 章　旅行书写与翻译研究

从概念上讲，翻译与旅行如出一辙；其区别在于抽象度的不同。一个强调抽象，一个强调具体。在概念上和实践中，二者的共通之处在于都专注于关系、指称和自我指称。它们都是通过一定的模式、网络或者意义指称系统建立起来并发生作用的；都或含蓄或直接地依赖相似性、隐喻和明喻。

——阿瑟·肯尼[1]

英国学者罗拉丹那·普拉热（Loredana Polezzi）曾就旅行与翻译之间的关系有过这样的论述："旅行书写传统与翻译一样，长期以来都为一种所谓的忠实和客观（旅行者是目击证人）的迷思所笼罩，然而实际上它是依据特定的意识形态和等级序列来阐释和表现现实的。"[2] 从这个意义上讲，旅行与翻译、旅行者与译者在一个国家的文化多元系统中的角色和地位一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另一方面则表明它们会或多或少地受制于特定的文化多元系统。与此同时，它们还会通过一定的模式、网络、场域、意义指称系统和话语体系建立联系并发生作用。

1　Kinney, A. F. Introduction. Pincombe, M. *Travels and Translation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Tudor Symposium*. Hampshire: Ashgate, 2004: xiii.

2　Polezzi, L. Rewriting Tibet: Italian Travellers in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or*, 1998(4.2): 322.

1.1 中国旅行书写与翻译研究的传统角色

从中国古代旅行书写所记述的“旅”“行”“游”“观”之各类形式及其话语主体及实践对象来看，它们在中国传统文化话语中是不居主流的，而这无疑与中国古代翻译话语中所记载的翻译和译者的传统地位及角色如出一辙。这样一来，翻译和翻译者的地位就如同古代旅行书写和旅行者的角色一样，处于本土文化多元系统的边缘。

1.1.1 “旅行”词源考证

在中国古代旅行书写中，“旅行”一词有着多种不同的释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总被赋予不同的思想内涵。在中国古代典籍里，“旅行”作为复合词开始使用大概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而当时的意思是指“集体出行”。《礼记·曾子问》就有“三年之丧，练不群立，不旅行”的记载，其中的“旅行”即指“群行，结伴而行”。汉代刘向的《说苑·辨物》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如“麒麟……不群居，不旅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旅行”言说方式，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古代，除极少数人（如帝王、官吏、学问家、商贾和僧侣）有个体旅行的机会外，大规模的个体旅行活动是罕见的。事实上，由于生产和生活条件的限制，早期人类的诸多事务还只能依靠整个部落或者是一个部落中的几个家族群体的集体力量来解决。当然，任何迁居别处的“旅行”方式，在当时也只能是一种集体的迁徙行为。而这种旅行和迁徙行为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1]

1 西方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如有学者指出：西方的迁徙行为本质上也是基于改善生态环境和经济条件而开始的。“疲惫的游牧者的出现是因为地理和气候改变的缘故。渴望旅行在当时也绝非是古代军队远征的理由。最早倚靠自己力量独自旅行的人群是商人。在古希伯来，‘商人’与‘旅行者’是同义词。只有一种情况例外，旅行对于这一个极少数族群而言，具有某种特殊的和显而易见的意义。这一‘在路上’的族群包括兵士、信使、政客、学者、行乞者、朝圣者和在逃囚犯。但当时绝大多数的旅行者还是那些买卖香料、香药、黄金、绸缎、武器和珍珠的商人。到十八世纪后期，较大规模的旅行才渐渐开始为人所知晓。”详细可参考：Enzensberger, H. M. A Theory of Tourism. *New German Critique*, 1996 (68): 122.